

无穷的困惑

这个时代的所有内心秘密，它的全部痛苦与欢乐，都深刻地记录在生活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生命旅程中。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承受了历史的沉重压力和艰辛使命，他们在交织着烈火、血污和雪崩的岁月里，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也选择了民族的命运。

黄炎培、 张君勱与 现代中国

近代中国宛如一座云雾萦绕的历史迷宫。当知识分子怀着救世的热忱跨入它的大门，去探寻通向光明的出口时，他们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到处都是陷阱、暗壁和死胡同，到处都是难以索解的现实悖论。

许纪霖 著

对于这两个经历异常丰富、多方有所建树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将这两个名字排列在一起，并非是为他们的一生作面面俱到的评述，而仅仅希冀透过知识分子这一角度，对他们进行深度的比较，从而揭示那样一种时代氛围下知识分子内心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行为选择。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无穷的困惑

许纪霖 著

黄炎培、
张君勱与
现代中国

上海三联书店

无穷的困惑

——黄炎培、张君勱与现代中国

著 者/许纪霖

责任编辑/任关华

装帧设计/鲁建德

责任制作/朱美娜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9.25

印 数/1-3000

ISBN7-5426-1061-9

K·73 定价 14.00 元

引 语 历史宛如一座迷宫……

历史,呈现着两种时代。

在一种时代里,前人早已铺下了社会运行的平稳路轨,清扫了驶向既定目标的脚下路障。人们仿佛被一个与生俱来的、悄无影踪却又无所不在的“命运”指点着、操纵着、摆布着,机械地重复着前人的脚印,走向约定俗成的人生终点。他们既没有深沉的痛苦,也没有狂热的欢乐;他们有的是自信、自足和安宁。他们的生命、文化连同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是统一、合谐、完整的。他们无须选择现实,现实也不容他们选择。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有条不紊地运转着、行进着……

在另一种时代里,维系那整个民族生存平衡的“命运”支点蓦然间粉碎了,消失了。时间的河谷出现了断裂,人们恰恰被抛弃在无可依傍的断层空间。社会越出了既定的运行轨迹,生活失却了原有的价值准则。到处是动荡、无序、混乱和不平衡,到处是脱节、错位、反差和不协调。过去的与未来的、垂死的与新生的、落伍的与超前的……在时间上是相距那般遥远的因素如今在空间上却错综杂乱地拥挤、纠缠在一块,互相冲突、碰撞、牴牾着。人们的灵魂也被撕裂成两半。他们失却了自信和安宁,他们在生命的十字路口迷惘、踟躅、徘徊。但严峻的现实又催迫他们作出历史的抉择,这抉择不仅决定着个人的前途,而且铸刻着民族的未来,因而显得

分外的凝重。这凝重之中浸透着人生的痛苦，又蕴含着创造的欢乐……这是茫茫史河中偶而出现的大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鲁迅）。

从公元 1840 年到公元 1949 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无疑属于那“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

降生在这样的时代里究竟是幸运呢？抑或不幸？无人能够辨晓。也许，这不幸的正是那幸运之所在，而那幸运的又是这不幸之渊藪。这个时代的所有内心秘密，它的全部痛苦与欢乐，都深刻地记录在生活于这个时代的知识者生命旅程中。近代中国的知识者承受了历史的沉重压力和艰辛使命，他们在交织着烈火、血污和雪崩的岁月里，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也选择了民族的“命运”。且不论他们的选择给他们个人带来了何等的荣辱毁誉，为后人酿造了怎样的历史果实，只要我们回首稍微注视一下，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在创造和选择历史的时候，曾经经历过多么浓重的困惑！

近代中国宛如一座云雾萦绕的历史迷宫。当知识者们怀着救世的热忱跨入它的大门，去探寻通向光明的出口时，他们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到处都是陷阱、暗壁和死胡同，到处都是难以索解的现实悖论：搏击政海兼善天下与隐居学界独善其身、变革政制求得“根本解决”与启迪民智徐图社会改造、强化国权以维系国家的统一安定与高扬民权以争取个性解放、为信念之纯洁超然于现实功利之上与求经世致用介入于世俗妥协之中、在良心的召唤下不惜震骇一时的牺牲与在痛苦的屈辱中坚持更加韧性的抗争……贯穿于近代历史的这一系列“二律背反”歧径，默默地铺列在中国知识者面前，考验着他们的智慧、虔诚和勇气。这是无穷无尽的“斯芬克斯之谜”，那谜底是如此的飘忽不定，难以把握，以至于知识者的思维世界中出现了深深的困惑。这困惑不仅源自现实社会的无解悖论，同时也肇发于主体选择尺度的多元性质：历史主

义与伦理主义的冲突、科学理性与人本感性的冲突……这种种价值体系的内在抵触使得他们仅仅凭藉智慧和理智并不足以作出清晰的决断；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用整个心灵，甚至借助本能、情感、潜意识等非理性力量来摸索前进的道路。挫折和失败经常伴随着他们，他们身心憔悴，满面尘土，但依然跌跌撞撞地行进着，怀着各自的信念和希冀在黑黝黝的历史迷宫里寻找迷失了的微光。终于，有的历经人世沧桑，在接近绝望的时时刻意外地发现了光明的出口；也有的误入死亡的歧巷，悲剧性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为了具体展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充满困惑的历史旅程，本书采用了传记的体裁，撷取了两个近代知识者的形象：黄炎培与张君勱。对于这两个经历异常丰富、多方有所建树的历史人物，作者既无意为他们的一生作面面俱到的评述，更不敢负有替故者盖棺论定的使命。之所以将这两个名字排列在一起，是因为仅仅希冀透过知识者这一角度，对他们进行深度的比较，从而揭示那样一种时代氛围下知识者内心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行为选择。为了论述的需要，作者将时常有意识地变换镜头的焦距，或者将视野拓展至社会大背景，对整个知识群作宏观的鸟瞰；或者将笔触探伸到传主的内心深层，对他们的信念、气质、追求……作细微的心理分析。就这点而言，本书决不是一本编年史般的人物传记，而是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更多地凝聚着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反思。

我相信，对于这样一段并非显得遥远的历史和在这历史中知识者们近乎悲壮的探索历程，当代中国的读者们是不会淡漠，以致无动于衷的，因为我们与他们同样有幸处于一个大时代。如果本书所揭示的近代知识者道路有助于启迪历史的后继者于万一，我将感到无上的宽慰。

目 录

引 语 历史宛如一座迷宫·····	1
-------------------	---

大变动时代的两个弄潮儿(1878——1912 年)

洋学堂的文化产儿:历史的裂断与联结·····	3
启蒙与改制:救国主潮的初择·····	14
掺合着感佩与屈辱的留学生涯·····	21
会聚于立宪的旗帜下·····	31
变中之不变:安定至上、秩序至上·····	38

政海与学海:进退维谷的困境(1913——1930 年)

黄炎培:浊浪中的激流勇退·····	53
张君勱:姗姗来迟的醒悟·····	63
进退之间的矛盾与踟蹰·····	77
万般无奈中的苦痛退隐·····	91

历史,设下了布满陷阱的迷津(1931——1936 年)

危机意识下的第三度入世·····	103
发掘于民族心理的国难反思·····	111

中西文化激荡中的迷惘与超越·····	120
通向统一的歧径:民主乎?独裁乎?	132

重庆与延安:两极中的持中与倾斜 (1937——1945 年)

政治天平上的平衡与失衡·····	145
独立与生存:淫威下的两难抉择	158
1943 年,人心向背的转换点	170
感情的天平指针摆向延安·····	181

从独立到依归:不可违抗的必由之路 (1945——1949 年)

幻觉中的第三条道路·····	197
“死马当作活马医”:以喜剧收场的一幕悲剧	207
“国大”门槛上的人生大曝光·····	220
“一念之差”背后的深层动因·····	232
旅程的归宿:新生与毁灭	242

综 论 一条永恒延伸着的困惑长链	260
------------------------	-----

大变动时代的两个弄潮儿

(1878 ~ 1912 年)

洋学堂的文化产儿：历史的裂断与联结

倘若你有意去翻阅中国知识分子家族的几千年变迁历史，就不难注意到那 19 世纪 70—80 年代，曾经降世了这样一批人物：他们是古代最末一批封建士大夫，也是中国第一批近代知识者。他们身上，似乎跨越了两个时代、两重历史和两种文化。他们分割着历史的时间，同时又在空间上将之联结起来，承受着新旧转换的时代桥梁。无疑，这是一代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知识者。本书的两位主人公黄炎培和张君勱，也都恰恰有幸得以置身其间。

公元 1878 年 10 月 1 日（农历 9 月初 6 日），在黄浦江东岸的川沙县城，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了。他就是黄炎培，字楚南，后改为任之。黄炎培父亲黄叔才是个穷秀才，初在乡里设塾授徒，而后出门漫走河南、广东、湖南等地做督抚的幕僚。幕僚的收入本已有限，况且他生性豪侠，得银即使，家中经济境况自可想见。黄炎培晚年曾在诗中感叹：“人说儿时乐，怎识得我儿时苦！”也许，对童年的他来说，最大的慰藉莫过于母爱了。母亲孟樾清出身于大户人家，知书识礼，克俭本分。她对聪颖的小儿黄炎培寄予殷殷厚望，经常将他抱在膝上，教他识字认书，还给他讲述方卿的故事，激励他“将来必须争气”。然而，命运仿佛故意要与黄炎培作难，在他 13 到 17 岁这 4 年之间，母亲、父亲以及赡养他的外祖父竟一一病逝。黄炎培无论在生活抑或精神上

都成了无依无靠、凄凉哀苦的孤儿。他过早地失去了孩童的天真。冷峻的环境迫使他比一般的同龄孩子显得早熟、老成。尽管有亲戚的悉心照料，然而寄人篱下毕竟应有所规束，比不得在母亲膝前自在快活。世态之炎凉、人情之厚薄无不磨砺了他性情的敏感和乖巧。经常的内心克制、自我压抑使他在谨慎、随和的外表背后，积淀起一个相当倔强的个性世界。黄炎培后来是以“外圆内方”的处世风格著称社会的，说其在少年时代即已定型未免夸张其词，但早年那段艰难的经历毕竟在他今后的一生中刻下了最初的印痕。

与不幸的黄炎培相比，张君勱几乎称得上是命运的宠儿。当黄炎培已能熟背四书的时候，在黄浦江对岸相距不过近百华里的嘉定县城，张君勱于1887年1月18日（农历12月25日）降生于当地一门望族世家。张君勱本名嘉森，君勱是他的号。张家世代经商、行医，家族中多有登科入仕者。张君勱的祖父张鼎生，是道光丁酉科举人，在四川任知县十余年，卸甲归乡后以宦囊所遗购乡舍数椽、农田数十亩，生活逍遥自在。伯父张祖恩、张祖寅，分别以附监生、拔贡资格分发浙江、广西任知县，颇为耀祖光宗。唯独父亲张祖泽，奉祖父之命以医术传其先祖家业，设诊所于南翔、真如一带，小有医名。张君勱生长于此等殷实富家，自是无忧无虑，多蒙世泽。他兄弟姐妹共11人，大多气质不凡，有承继家风、不辱先祖之强烈意识，其中以张君勱为尤。他自幼智敏过人，自视甚高，有“军师”之称。争强好胜、出人头地的脾性早在童年即露端倪。张君勱祖籍为宝山，一次他与乡人同去参观胡公祠，在肃穆的祠堂里，张君勱低声问旁人：胡公何许人也？同行者告诉他：胡公乃乾隆时代我宝山邑宰。宝山地处东海之滨，每年夏天台风季节常有海潮袭击之虞，胡公为乡人安全，不惜倾家革职，在县城东门外主持修筑长堤。胡公死后，乡人即募款修建此祠，以报胡公之无量功德。张君勱听罢，不禁脱口呼喊：“伟哉胡公！此为胡公不朽、顶天

立地之事业!”^①钦慕之情溢于言表。此语出自一个 17 岁少年之口,足见主人公之胸襟与抱负。伟哉、不朽、顶天立地、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些诱人的字眼使得张君劢久久地激动不已,并成为他自人生起步始便孜孜以求的终身目标。

宽泛地说,黄炎培和张君劢都出自书香门第、礼教世家。不过由于两人在门第层次、家庭景况、个人遭遇诸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在气质上从少年时代起也就显现出相当的反差。黄炎培在 16 岁时曾迫于生计到一家亲戚开的小店铺去站柜台,以后又继承父业去私塾教书。因之他得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越士大夫家庭的封闭圈子,接触到社会底层的苦难生活。在他晚年的回忆中,故乡贫民的悲惨景况比比皆是:被当众鞭挞的流浪儿祝三团;衙门大堂中被打得鲜血淋漓的犯人屁股;身着长衫、手持折扇而满街乞讨的文丐;酷爱念书却又不幸成为放牛郎的幼年伙伴顾连生……这一切与他自己那孤独凄凉的单薄身影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童年的阴暗记忆。在默默受苦的民众面前,他很少意识到自己这个阶层的精神优越感;相反地,个人的不幸却使他与这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心灵的沟通,仿佛他与他们一起承受着人世的悲哀。黄炎培成年之后,尽管长期栖身于现代闹市,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却始终未曾与底层的民众割断那感情的脐带。他的一生染有相当鲜明的民粹色彩。

相形之下,张君劢的童年则要明亮得多。同是生长在小县城里,他却绝少顾及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他意识到自己在身份和精神上的高贵优越,欲追求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生;而他们忙忙碌碌,不过在谋求温饱而已。如果说,黄炎培鉴于童年时代的阴暗记忆,毕其一生都格外看重“生计问题”,尤其是贫民大众的“生计”的

① 见金刚城:《童年时代的张君劢先生》,《张君劢先生七十寿辰纪念论文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96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话；那么，对童年的张君勱来说，“生计”这个全然不成问题的问题，简直是无暇被顾及，甚至不屑被一顾的。张君勱更关切的是人类的理想和精神的自由。也许这就是以后黄炎培不喜作纯思辨的玄想，宁愿做一个“解决人类生计问题”的职业教育家；而张君勱却视“唯物论”为媚俗，好在理念世界中作精神遨游的思想家的最初缘由。在交友风格上也同样可以窥见两人的歧异。黄炎培自幼无所依傍，他不得不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确证自己人身和精神的地位，因而从教授、老板、流氓头子，到店员、轿夫、穷学生……三教九流无不交结；张君勱却有着士大夫的矜持和清高，只看得起那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学士，交友圈子仅仅局限于他所在的那个知识阶层。

与上千年来每个中国封建士子一样，他们都是在琅琅的读经声中开始了自己的启蒙教育。黄炎培7岁起随两位小叔子诵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两年后进外祖父的家塾东野草堂再诵读《五经》：《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张君勱则在5岁时被送进家塾，与诸堂兄弟一起读经。也许是天资聪颖、记忆过人，也许是自觉意识到这一切皆是书香子弟的天经地义，两位少年读经都不以为苦事，而显得相当轻松自如。黄炎培“当天不须读满十遍，明天清晨，老师前背诵，保证一字不差”^①；张君勱则“幼习《论语》，提章质问，迥不平凡”，令同窗老生“每为所窘”^②。四书五经读完之后，便都广览群书。对他们来说，读书不仅仅在于消遣，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他们都想方设法去各处搜觅书籍，以飨自己。张君勱少年时常去附近的罗店镇作客，归来后家人问他那里某家某人近况如何，他每每茫然不知作答，唯独谈起某家藏有何种好书，则可一一历数，绝无遗漏。黄炎培读书更为便利。他舅公沈树镛是江南小有名气的藏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2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金刚城：《童年时代的张君勱先生》。

书家，沈的儿子沈肖韵极为器重他，将自家的书斋毫无保留地向他开放。因之于短短几年中，他在沈家通览了诸子百家、二十四史、唐宋诗词，并选其所好，再三细品。十年过后，当黄炎培被人密告是革命党人，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奉两江总督端方之命召他前往面询，诘问他平日读过何书时，黄炎培颇为自得地一口气报出上述书单，竟使提学使大人涣然冰释，理由是既然读过如许古书，选择又如此精当，所谓革命党人之说必属诬言！这样的结局令黄炎培也惊讶不已。当年他读四书五经，习做八股，无非为登科入仕，博览古籍也不过出自本能的求知欲，何以料到有朝一日竟会起到掩护革命的功效！

倘若他们不曾降生于近代，倘若西方列强的炮舰推迟一个世纪叩开古老中国的锁闭大门，黄炎培和张君勱势必步随先辈的足印，走向那条在中国士大夫中因袭了一千年之久的漫漫仕途，在浩瀚如海的官宦名册中添上两个黯淡的名字。然而他们却有幸撞见了一个大时代，一个无论对于整个民族抑或每个青年士子来说都需要重新学步的大时代。过去是时代创造着人——一成不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依循一成不变的程序设计，复制出一成不变的诸代士大夫；如今该由人来创造历史了——文明古国在欧风美雨的打击下再也不可能在传统的历史轨迹上继续运行了。

当黄炎培 16 岁、张君勱 7 岁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马关条约》的耻辱签订和随之而来的割地狂潮构成了近代中国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如果说，在这之前除了少数感觉敏锐的忧患者外，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依然沉酣在“以夏变夷”的昏昧旧梦中的话，那么，触目惊心的现实危机终于迫使他们睁开了睡意朦胧的眼睛，促发了他们对异域的普遍好奇和开拓视野的心理欲求。在强烈的救亡意识驱动下，关心时务、谈论西学一时在士林中蔚然成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趁势鼓动，译西书，掀西潮，为变法维新作舆论准备。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自然得风

气之先。身居近郊的黄炎培、张君勱耳濡目染，大受其惠。当时，黄炎培时常阅读那张用油光纸印刷的古色古香的《申报》，从中了解到“中国有亡国的危险”，遂“开始觉醒”^①。严复的《天演论》出版后不久，他便在沈家的书斋中得以先睹为快。他的耳目为之焕然一新，“恍然大悟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掩卷细忖，却又触景生情，“不免顾虑并怀疑到国家前途究竟将变到什么样”^②？自此之后，他对西学的兴味日见浓郁。他当时正在乡下当塾师，终日“之乎者也”的贫乏无聊愈发令他不可忍耐，一得空闲便进城一头扎进沈家书斋，饱餐新学。沈肖韵是个新派人物，喜购各类西书，这使得黄炎培有机会接受了相当数量的西学知识。

正当黄炎培在川沙一隅通过自学接受西潮洗礼之时，张君勱却有幸在 1897 年奉母亲之命考入上海一家著名洋学堂——广方言馆。广方言馆原由李鸿章在 1863 年仿北京同文馆之例而设，亦称“上海同文馆”，后移入江南制造局。当时科举尚未废除，一般人只知道做八股考功名，可以做官。虽然西学在士林中已渐趋时髦，但时人大多认为念洋学堂既无功名，又做不了官，读了等于白读，因此尽管学堂当局以每月津贴白银一两招徕学生，应考者依然寥寥。张氏母亲不随时俗，决然送子入学，这确乎值得张君勱感激终生。

广方言馆每星期的课程安排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在四天读英文的时间，并不完全读英文，而是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都属于英文。每一科好像读四书五经似的，全要背熟。……三天读国文，就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功课。”^③ 这种学堂冠以“新式”二字仅就比较旧式书院、

① 黄炎培：《自述四十年来服务社会所得的甘苦》，《国讯》302 期。

② 黄炎培：《怎样显出中华民族性》，《空江集》，生活书店 1937 年版。

③ 张君勱：《我的学生时代》，《再生》239 期。

书塾而言,传授的西学之粗陋、浅芜自不待言。纵然如此,少年的张君勱也毕竟开了眼界,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①。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学堂的国文先生袁观澜。他是张君勱的宝山同乡,举人出身,国故底子厚实,汉学、宋学以及天文地理皆深有所得。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之际,袁先生尤重通经致用,他特意选出“三通”^②,要求学生熟读。10岁的张君勱能领悟书中多少真谛固然令人怀疑,但有一点却确定无疑:它触发了这位有志少年对政治制度的盎然兴味,以后那一连串的自觉选择不过是这童年兴味的自然沿续而已。从无序的“学科泛爱”到有序的专业定向,往往起始于一个极偶然的机遇。不过在这仿佛是偶然的机遇幕后实际上隐藏着一只无形的必然性之手——自甲午海战惨败之后,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日趋成为众人关切的历史母题。

到1901年,黄炎培在沈肖韵的资助下也考入了上海另一家洋学堂——南洋公学。南洋公学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由清末大官僚盛宣怀在1896年集资创办,与广方言馆一样都是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但在气派规模上却较后者远为逊色。黄炎培所考取的特班,是专为培养高材生,而特收已有一定旧学根底的学生的班级;学校拟授以外语及经世之学后,择优保送经济特科。特班中可谓人才荟萃,除黄炎培之外,还有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胡仁源等一大批未来的名人。黄炎培真是三生有幸,他在这里遇上了刚刚辞职于绍兴中西学堂、就任南洋公学特班中文总教习的蔡元培先生。这位“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大清翰林,此时已成为热心传播西学的维新志士。不过在救国的具体途径上,他与康、梁诸人见解颇异,认定“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

① 张君勱:《我的学生时代》,《再生》239期。

② “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是三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